

周玉良 主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
国家级重点课题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史

主编 张彬



周玉琼 主持

100100 杭州师范大学

311121 杭州

0571-86112322

中国地方

教育史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史

周玉琼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史

主 编 张 彬

副主编 李明华 应坚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教育史 / 张彬主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38-6763-7

I. 浙... II. 张... III. 教育史-浙江省
IV. G527.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931 号

责任编辑 王晴波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戴正泉 **责任印务** 温劲风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浙江教育史

主编 张彬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310013)
图文制作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4.125
插页	5
字数	918 000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7-5338-6763-7/G·6733
定价	98.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 转 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址	www.zjeph.com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编委会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名誉顾问	何东昌	杨海波	邹时炎	陶西平		
顾问	王炳照	田正平	江 铭	郭福昌	潘懋元	
主 编	周玉良					
副主编	汤世雄	宋恩荣				
编 委	王日新	王豫生	方 骏	冯象钦	齐红深	
	刘文璞	安效珍	李才栋	李定开	杨进发	
	张凤民	张 彬	陈乃林	陈光华	金汉杰	
	赵宝琪	姜树卿	高 志	阎国华	符康荣	
	傅九大	蒙荫昭	蔡寿福	熊贤君		

《浙江教育史》

编纂委员会

主任 侯靖方

副主任 郑继伟 张绪培 鲍学军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泉	方永平	方展画	叶向群	边 颀
李明华	励如孟	吴永良	应坚志	张其宏
张 彬	邵若愚	金一斌	骆 丹	郭申初
葛为民	韩 剑	褚子育		

编写组成员

主 编 张 彬

副主编 李明华 应坚志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瑶	叶哲铭	孙继亮	仲玉英	吕 苹
李更生	应坚志	李明华	庞志康	张 彬
唐晓明	郭耀邦			

总 序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本项目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流。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应有新的发掘,新的创造。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的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对民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味、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我国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一方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居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间接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对教育的影响,应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升沉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融合,人口的增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学派的相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

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区”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标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角看,以上两种空间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定的重合。

对各省区发现的 700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6000 至前 2000 年间的文明曙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已分别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以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区,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中州文化区、荆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区、燕赵文化区、关东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黔贵文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闽文化区、岭南文化区、陇右文化区、草原文化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相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相互间的交通、人口迁徙,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今天的行政区划是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相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不能忽视的。

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队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荒等

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民族迁徙。这些都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从东汉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民族入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批中原人民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外,还有历代因罪而被贬谪的官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论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徒,都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习俗。如东汉末年,会稽大儒虞翻因直言获罪,被贬交州(含今广东、广西)。但他“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迁为柳州刺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孔庙,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教育、广西教育,而且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近代来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大规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聚集,形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心,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新思想、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块偏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这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的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与总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教育发展的丰富而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还需揭示历史本质,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相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并要不断地加强对新知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沿,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试图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历史科学的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观点、视野、视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锐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改观,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等简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的治学模式,已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日渐丰富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快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社会心理都日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客观、冷静、开放、包容的态度,更加高屋建瓴地来审视过往的历史。我们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绿洲,结出累累果实。我们相信,通过展现地方

教育史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这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备的。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切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

绪 论

一

浙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遍布于东南一带“百越”文化的发祥地。据 2002 年最新的考古成果，早在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今天的浙江境内活动。距今约 7000 年前存在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6000 年前存在于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与距今约 5000 年前存在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吴越文化的主流，后来又与存在于浙江中西部地区及浙南瓯江流域的两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建立起可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史前文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浙江境内以会稽（今绍兴）为都城的越国曾经十分强大，越王勾践懂得教育的重要意义，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打败了吴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浙江设置郡县，试行“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西汉末年北方战乱频仍，大批士族、农民、手工业者避乱到江南。北人南移，加快了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浙江教育的发展。东汉时上虞县孕育出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充，据记载，王充就读的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足以证明该地区的文化教育已有一定基础，私人兴办的蒙学机构颇具规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大多发生在北方，南方相对比较安定，因而文化南移的现象较之西汉末年更为普遍，尤其晋室东迁与定都建康（今南京），中原一带世家大族和学者纷纷涌向江南。浙江境内最早的地方官学建于两晋，即西晋太康年间（280—289 年）创建的平阳县学宫和东晋太宁年间（323—326 年）创办的永嘉郡学。而这一时期最有特色的是世家

大族所注重的用以维系家族传衍的家学,如会稽虞氏家族世代精于儒学,旁及史学、天文学、书法等,历经晋、宋、齐、梁、陈、隋而不衰。

自隋唐起,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浙江教育也渐趋兴旺。至唐代,在当时的湖州、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衢州、处州(今丽水)已设有州学,在富阳、平阳、松阳、缙云、诸暨、鄞县、嵊县、奉化等县已建有县学,并有士人设立书院以作治学授徒之所,如龙游县的九峰书院、寿昌县的青山书院、越州的丽正书院、象山县的蓬莱书院、诸暨县的溪山书院等。唐代浙江教育的渐兴,一是由于朝廷对地方官学的建制已作出明确规定;二是源于科举制度确立后对文风的促进;三是开凿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此外,也与热心教育的地方官有关,如唐天宝十四年(755年)被贬谪至台州任司户参军的郑虔,在州城临海开设学馆,吸收民间子弟入学,并亲自掌教,使台州一带“土风渐进,民俗日淳”。五代时吴越国建于今浙江一带,钱缪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在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同时,建国学,聚图籍,使教育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北宋的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一方面通过改革并完善科举,大量选拔和重用文人,另一方面重视学校的育才功能,前后促成了三次兴学运动。其时,国家的政治中心虽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已移至江南,浙江所属地域成为全国最富庶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兴学创造了条件,而地方官中又不乏重视文教之人,如苏轼任杭州通判、范仲淹任睦州和越州知州、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期间,均主张设立学校,发展地方教育。据统计,北宋两浙路所辖14州中,属今浙江境内的11个州已经遍设州学,65个县中也大多设有县学。各州县学中,以湖州州学办得最为出色。康定元年(1040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延请胡瑗来湖州主持州学。胡瑗针对崇尚声律浮华之词的学风,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将州学分成经义、治事两斋;治

事斋设农田、水利、军事、历数诸科，学生学一主科，兼学一副科。胡瑗掌教期间，州学名声大振，四方学子云集受业。

南宋的临安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太学、宗学、武学、医学、画学等中央官学在城内陆续建立，其中以太学、武学、宗学的地位和声誉最高，合称为“三学”。南宋太学建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由岳飞故宅扩建而成，分孔子庙、教学区、斋舍区三部分，规模宏壮，内藏宋高宗及吴后手书的《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等石经，作为太学生攻读儒家经书的标准教材，还藏有宋代历朝有关教育的“御札”、“御制”。太学初建时学生仅以300人为额，以后规模逐渐扩大，至咸淳年间增至1700余人。南宋浙江分属浙西、浙东两路，有五府六州，领66县，基本做到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自宋代起，浙江的蒙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临安府的贵胄小学和附设于州县学的小学外，更大量的是民间所办的义塾、私塾、冬学等。浙江学者编写的蒙学教材也丰富多样，颇具影响，如识字教材中最为著名的《三字经》是鄞县王应麟所作；侧重于伦理道德教育的《童蒙训》和《少仪外传》分别为婺州（今金华）吕本中和吕祖谦编写；流传很广的诗歌类教材《神童诗》是鄞县汪洙所作；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鸟兽草木等常识的《名物蒙求》为淳安方逢辰编写。此外，萌芽于唐代的书院教育，至北宋形成制度，南宋时各县所设书院多达190余所。与府州县学不同的是，书院乃私人兴办或半官办性质的教学机构，主持者为地方名师宿儒及当地守土官吏，其建置大多远离繁华之地，对促进偏僻地区的文化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著名学者通过书院讲学阐发自己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南宋浙江的学术争鸣和文化繁荣。朱熹曾多次来浙江传播理学思想，在不少书院讲过学或留下遗迹，如上虞的月林书院、东阳的石洞书院、江山的南塘书院、淳安的瀛山书院、浦江的月泉书室、开化的听雨轩、缙云的独峰书院和松阳的明善书院等。庆元府（今宁波）有以传播陆（九渊）学为宗旨的四明学派，代表人物为舒璘、沈焕、袁燮、杨简，亦称“甬上四先生”。他们

讲学的碧沚书院、城南书院、广平书院、竹洲书院在浙东名闻遐迩。吕祖谦在学术上力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矛盾，并兼取其长，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称婺学，或吕学。作为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其授徒讲学的婺州丽泽书院声名远播。浙江还是事功学派的发源地，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倡导的以培养治国用兵有用人才的教育目标，以实事实学为中心的教育内容，以及学以致用、勇于创新的学风和精神，不仅对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思想进行有力批判，而且是对传统教育重文轻武、重道轻艺弊端的深刻反思。事功学派的教育主张是从封建传统教育思想中离析出来的一股清流，至明末清初为早期启蒙思想所继承，对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浙江在两宋时期已经奠定了学术繁荣、文风鼎盛的基础，至元、明、清三代，依然教育发达，文风不衰。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府、州、县学普遍设立，社学、义塾、私塾等蒙学机构自城镇向乡村发展。社学是设在农村地区利用农闲空隙时间以农家子弟为对象的教育机构，始建于元，兴盛于明。洪武八年、洪武十六年，朝廷先后诏令设立社学，促使各地社学勃兴，当时仁和县就有社学 221 处，钱塘县有社学 176 处。其二，书院大量设立，讲学之风极盛。明代浙江有书院近 300 所，清代增至 570 余所。这些书院大多讲求理学，或以学习制艺为主，但清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学风独特，生徒在攻读经史的同时，兼习天文、地理、数学。诂经精舍前后存在 100 余年，后期聘著名学者俞樾任主讲时，“两浙之士，承闻迪训，蔚为通才者，不可胜数”。其三，民间读书藏书蔚然成风。明清两代，浙江藏书楼之多，藏书之丰富，为全国之冠。明初金华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楼开风气之先，此后吴兴茅坤的“白华楼”和沈节甫的“玩易楼”、嘉兴项元汴的“天籁阁”、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和纽石溪的“世学楼”等，均堪称藏书名楼。清代，继之而起的藏书楼有黄宗羲的“续钞堂”、慈溪郑性的“二老阁”、宁波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嘉兴曹溶的“静惕堂”、杭州吴焯的

“瓶花斋”等。众多藏书楼中以“天一阁”最为著名,被誉为浙东藏书第一家。其四,人才之盛位居全国前列。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对明清两代进士数的地区分布统计,在5万余名进士中,浙江以6379人名列首位。^①明史所收人物1771人中,浙江籍有258人,占14.6%,居各省之首,清乾隆元年(1736年),诏举博学鸿词之士,全国先后举267人,浙江有68人之多。明清时期浙江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教育家。明代最有影响是王守仁,他继承并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大相径庭的“阳明学派”,其思想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中叶以后广为流行。他主张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接受能力施以教育的思想,“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出现了一批早期启蒙思想家,朱之瑜、陈确、黄宗羲即为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批判封建制度、寻求变革良方的同时,提出了带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教育思想。

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宁波成为最早的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接着,英国又利用马嘉理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温州也于1897年作为口岸开放。宁波、温州的相继开埠,对浙江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纷至沓来的传教士从沿海逐渐深入到内地,在进行传教的同时也注重开办学堂。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东方女子协进会会员爱尔德赛(Miss Aldersey)在宁波城内祝都桥开办女塾,是中国大陆境内最早的教会女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

^① 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载《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